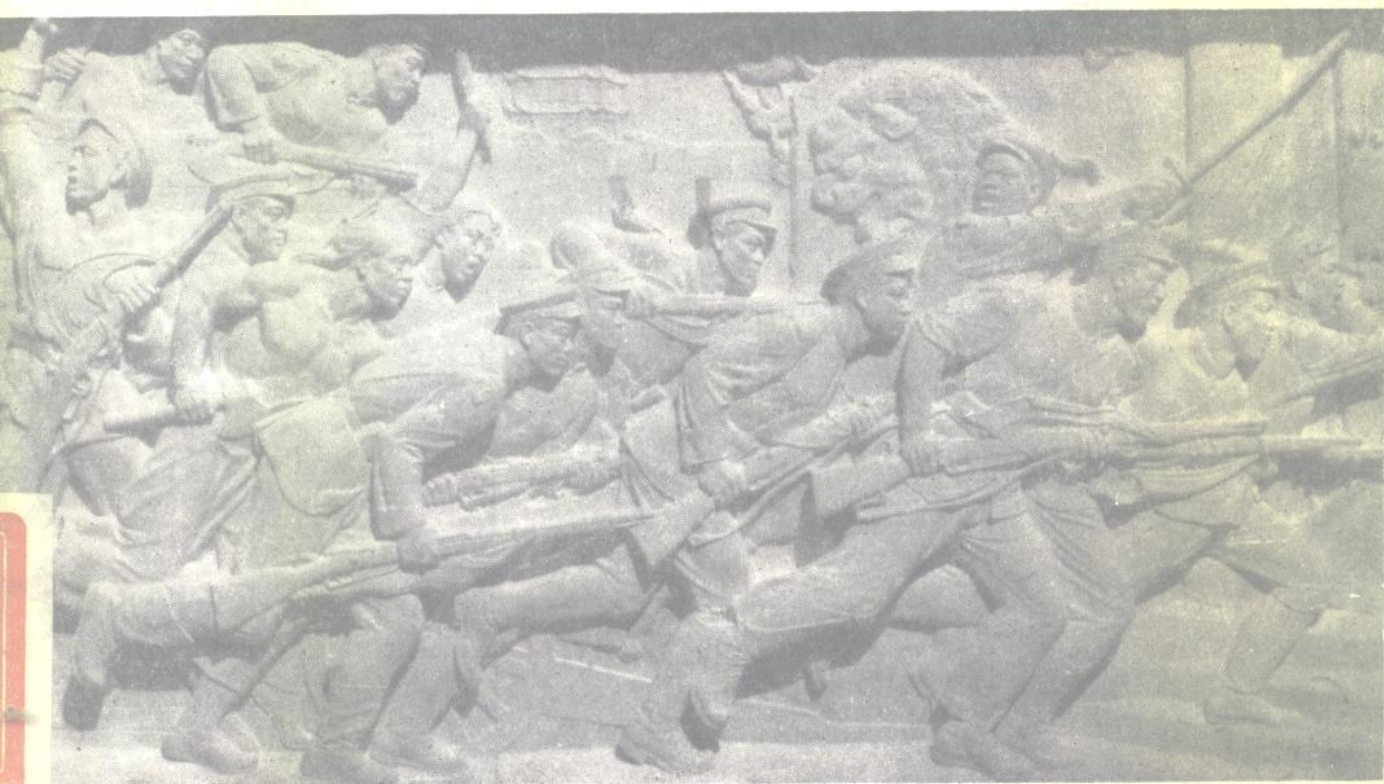


辛亥革命史丛刊

第七辑

《辛亥革命史丛刊》编辑组编

XINHAIGEMINGSHI CONGKAN



中华书局

辛亥革命史丛刊

第七辑

《辛亥革命史丛刊》编辑组

中华书局

辛亥革命史丛刊

第七辑

《辛亥革命史丛刊》编辑组

*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1/16·19印张·414千字

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2,300册

统一书号: 11018·1402 定价: 3.15元

ISBN 7 - 101-00049-5/K·22

编 者 的 话

本刊是一个不定期的学术集刊，由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编辑，目的在于为辛亥革命史研究者提供一个交流研究成果和刊载历史资料的园地。

凡有关辛亥革命史的论文、考订、史料、图片、年谱、回忆录、译文、书评以及学术动态等，欢迎投稿。来稿字数多少不拘，如篇幅较长而又确有价值者，可以分辑连载，或作为《辛亥革命史研究丛书》出版。

来稿请写明真实姓名、详细地址、发表时的署名，邮寄“湖北武昌华中师范大学转《辛亥革命史丛刊》编辑组”。由于本刊无专职工作人员，来稿务希缮写清楚，并认真核实引文，以免增加发稿和校对时的困难。

本刊尚属草创阶段，编辑工作缺乏经验，错误与缺点在所难免，希望广大作者和读者随时批评指正，并且不断给予大力支持。

《辛亥革命史丛刊》编辑组

一九八〇年七月

目 录

论1902—1905年的国内学潮	桑 兵 (1)
二十世纪初年中国反帝爱国史学初考	俞旦初 (42)
粤商自治会与反帝斗争	廖伟章 (61)
§ 读史札记 § 清末资产阶级国粹派的几个问题	范明礼 (71)
湖北起义首领孙武传	高筹观 原著 刘望龄 辑校 (91)
贵州《自治学社杂志》资料	严 平 整理 冯祖贻 校订 (115)
清末民初吴江、震泽农民土地占有及负担档案选	吴江县档案馆 (191)
辛亥革命在日本的反应	〔日〕白井胜美 著 章伯锋 译 (211)
中国革命记: 1911—1912	〔英〕埃德温·J·丁格里著 莫世祥 译 岑麟宾 校 (222)
革命日记(连载之三)	《汉口日报》编辑 万小楠 译 (266)

CONTENTS

No.7, 1987

- On the Student Movements at Home Between 1902 and 1905
.....Sang Bin (1)
-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into the Chinese Anti-imperialist
and Patriotic Historiography Early in Twentieth Century
.....Yu Dan-chu (42)
- Yue Shang Zi Zhi Hui* (Kwang tung Merchants Autonomy Society) and
the Anti-imperialist Struggle.....Liao Wei-Zhang (61)
- (Reading Notes on the History) Several Problems of Bourgeois
Guo Cui Pai (National Legacy School) towards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Fan Ming-li (71)
- A Biography of Sun Wu, the Leader of Hubei Uprising
.....Original by Gao Chou-guan Edited and Revised by Liu Wang-ling (91)
- The Journal of the *Zi Zhi Xue She* (Gui zhou Institute of Autonomy)
.....Collated by Yan Ping Revised by Feng Zhu-yi (115)
- Selected Archives about Peasants' Land Ownership and Burden in
Wujiang and Zhenze Regions at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and
Beginn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rchives of Wujiang County (191)
- Response Caused by the 1911 Revolution in Japan
.....Usui Katsumi (Japan) Translated by Chang Bo-feng (211)
- "China's Revolution" (*Zhong Guo Ge Ming Ji*) (extracts)
.....Edwin J. Dingle (Britain) Translated by
Mo Shi-xiang Revised by Cheng Ling-bin (222)
- Diary of the Revolution (Serial III)Editor's Department of
Hankow Daily Translated by Wan Xiao-nan (266)

论1902—1905年的国内学潮

桑 兵

近代中国的青年学生，是民主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民主革命的各个阶段，“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①。特别是在辛亥革命时期，青年学生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的先进分子还分担了政治指导者的重任，在中国这个大舞台上导演一幕雄壮的历史剧，从而留下了他们光彩照人的生动形象。

本文认为，1902—1905年的国内学潮，以南洋公学退学风潮为正式开端，以拒俄运动为高峰，直到抵制美货运动爆发和同盟会的成立，经历了从发生到高涨和表面上缓退实际上深入三个各具特点的发展阶段，形成了以长江中下游和华南地区为中心，波及全国十几个省份的学生运动，和留学生运动一样，为革命高潮的到来做了思想和组织准备，同时开创了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学生运动。通过对它的分析研究，可以加深认识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风尚的变化和青年学生的精神风貌，更好地把握辛亥革命之所以取得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胜利的社会原因，更加深入地探索促发辛亥革命的国内政治因素。此外，学生们在此期间开始从正面批判封建宗法思想和礼教观念，对“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一、近代中国学生群的形成及其主要成份的阶级属性和政治动向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历史上，也曾发生过“学生”运动，如东汉末年的太学生，明朝万历、天启年间的东林党。然而，与近代学生不同，这些人是属于封建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士”，他们的活动虽有某些积极意义，也只是统治阶级内部不同政治集团的斗争，而不是站在封建专制的对立面来根本否定它的统治，其目的显然是“补天”而非“拆庙”。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发展和西学的传播，中国出现了一小批由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转化而来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放眼世界，不满清朝的腐败，开始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向封建制度冲击；同时，一些封建士人在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的引导下，也在探索解决中国内忧外患的途径。刚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转化过来的资产阶级政治代表人物，在要求资本主义改革时利用了传统的变法形式，使其政治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士”的支持，开创了近代知识分子活动的新阶段。1895年的“公车上书”，

^①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604页。

就是以“士”为主体，在刚转化来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领导下进行的一场颇有声势的斗争。

此后，以新式学堂学生为代表的近代知识分子运动逐渐兴起。戊戌变法期间，湖南时务学堂学生成为当地维新运动的骨干。1900年自立军起义时，留日学生和湖北武备学堂、两湖书院的学生起了重要作用。不过，这些活动还没有形成为学生运动。

近代中国的学生运动，是随着学生群的初步形成而展开的。戊戌以前，国内新式教育主要是清政府在洋务活动中举办的一些学堂和传教士办的教会学校，这些学校不仅政治上大多是为帝国主义侵略利益或买办活动服务，而且体制极不完善，只限于语言、工程、军事等学科。一些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家，特别是后来的康有为、梁启超对此曾予以猛烈抨击，斥责这种学堂“仅为洋人广蓄买办人才”。^①他们主张：“今日之学校，当以政学为主，以艺学为附庸。”^②并参照欧美和日本的学制，提出了一整套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和规划，还创办了一批学堂，以为其政治活动服务。一些洋务派官僚在各方面的压力下和出于自身的需要，也开始注意兴学育才，创办了一批教授普通学的新式学堂，并且改造和兴建了一批具有学堂规模的新式书院。这就为近代中国学生群的逐步形成提供了基地。

百日维新把变法运动推向高潮。在变法浪潮的推动下，新式教育有一个比较大的发展。当政变后慈禧下令尽废新法时，一些重权在握的洋务派封疆大吏站出来表示反对，提出“书院不必改，学堂不必停，兼收并蓄，以广造就而育真才”^③，要求清廷继续兴办学堂。洋务派督抚与慈禧的矛盾，有利于后来新式教育的发展。

辛丑和约后，清政府实行“新政”，兴学又成为新政的重要内容。到1903年初，已有11个省设立了高等学堂。与此同时，国内舆论也竞相鼓吹发展教育为救亡图存的重要手段，掀起办学热潮。许多进步人士指责“疆吏之办学堂也，不过借此以聊博维新之名誉，逃外人之滋议，且可以多一安置私人之所”，^④主张自己培养救国人才。1902年后，江苏、浙江、江西、山东、广东等省进步人士，相继成立教育会，大声疾呼：“近今所最亲最爱最重最可期望为中国前途生色者，万口同声，金曰：教育！”^⑤创办了一批民办学堂；一些革命志士组建学校，以聚集和培养革命力量；有的官吏士绅以维持地方公益为名，集资兴建公立学校；此外，还有不少家道殷实的官绅商富在教育界人士的鼓动和清政府的赞同下，兴办私立学堂。义和团运动后，帝国主义也以办学为名，加紧文化侵略。这些人的活动尽管动机、目的不同，客观上都有利于新式教育的发展。到1905年，中国的新式教育体系已经初具规模，学生人数从1902年的6,912人猛增到1905年的258,876人，详见下表：

① 梁启超：《学校余论》，《饮冰室全集》文集1。

② 梁启超：《与林迪臣太守论浙中学堂课程应提倡实学书》同上，文集2。

③ 刘坤一：《书院学堂并行以广造就折》，《刘坤一遗集》奏疏卷28。

④ 杜士珍：《学生潮》，《新世界学报》第12期。

⑤ 朱鹏：《敬告教育诸公》，同上，第14期。

(一) 1902—1905年全国学生人数统计表^①

年 份	学生总数 (人)	小学学生数 (人)
1902	6,912	约 5,000 余
1903	31,428	约 20,000 余
1904	99,475	约 80,000 余
1905	258,876	约 230,000 余

(二) 一些重要城市学堂学生统计表 (1903—1905年)^②

城 市	统 计 年 月	中学以上		中学以下		备 注
		学堂数 (所)	学生数 (人)	学堂数 (所)	学生数 (人)	
北 京	1904年底	12		15		
天 津	1905年2月	9	756	30	3,516	
南 京	1904年9月	8		6		
苏 州		3		40		
武 汉	1904年春	18		71	3,000	
长 沙	1904年	25	1,620	32	1,367	另有民办 学堂19所
保 定	1904年12月	5	1,509	14		
杭 州	1903年10月	7	631	19	800	
福 州	1904年9月	10		43		
南 昌	1904年9月	8		13		

从表二中可以看出, 1904年底至1905年春, 一些重要城市已分别聚集了三千至四千学生, 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势力。

① 吴研固、翁之达:《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小学教育》,《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第26—27页。关于这一时期的学生人数统计,由于依据资料和计算方法不同,出入甚大。以下所举各城市及县、镇数字,都旨在证明这一统计数较为接近事实。

② 本表依据资料:《天津学堂调查表》,《大公报》第938号;《两江总督魏奏现办江宁省城并各府厅州县学堂大概情形折》,《东方杂志》第1年第10号;《湖北学堂纪数》,《南洋官报》甲辰第14期;夏立士《光绪三十年长沙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湖南历史资料》1980年第1辑第203页;《学务近况》,《汇报》第636号;《浙江省会学校一览表》,《浙江潮》第8期;其余均见1904—1905年《警钟日报》学堂调查表。

中小城镇的情形同样反映出当时兴学的盛况。以江浙一带为例,1903年号称中国教育之“最”的无锡城内有学堂7所,学生各50至60人,所属堰桥一镇也有7所小学堂。^①其它如嵊县有学堂31所,嘉兴16所,扬州8所,吴江12所,高邮12所,南浔6所,金山5所,南翔3所。^②有的偏远地区发展也很快,1904年底,湖南永绥厅申报已有学堂84所,学生1,228人。^③

在此期间,清政府的武备学堂加速发展,据直隶等十七省和青州、绥远的22所陆军武备学堂统计,学生人数即达3,048人。^④此外,还设有参谋、水师、鱼雷、军医、测绘、警察等专门学堂。当时军国民主义逐渐浸入知识分子心中,争学武备成为风尚。如1904年初浙江武备学堂招考时,“只数日间,报名者已有一百余人之多”。该省处州府青田县,是年到杭州及邻近各省投考者共一百多人,“尽属有志陆军”。^⑤这就大大改变了武备学生的成份,使之成为近代学生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生运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随着新式教育的发展,中国的学生队伍迅速扩大,虽然当时主要还是初等教育,但学生一般年龄较大。同时,这一时期学堂的发展打破了过去局限于军事、工艺等学科的状况,普通、师范和政治学等基础学科占了较大比重,有利于促进学生的思想变化。所以,从1902到1905年,一个分布全国、拥有一定数量的中国近代学生群已经初步形成了。

这个学生群与封建士人不同,他们受教育的地方是新式学堂,而不是私塾书院;所学内容包含有或主要是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学堂无论官立私立,一般都设有中外历史、中外地理、外文、法学和数理化等课程,这使学生得以阅读各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哲学、历史、伦理书籍,了解世界大势。因此,他们对于亡国危机的感受,是“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秀才、举子们所无法比拟的。他们虽然受过传统儒学的教育,但在西学的全面冲击下,没有封建士大夫那种愚顽不化的迂腐习气和政治上的守旧倾向。他们所处的时代以及他们自己的思想,都处在除旧布新的转变过程之中。正如蒋维乔所说:“盖中国现势在过渡时代,……而余之学[问]新旧交换,亦在过渡时代也,故则有动力。”^⑥“喜将新桃换旧符”,是他们对待新学与旧学和社会变革的普遍倾向。学生群是知识分子的一部分,知识分子范畴的确定,与阶级划分不同,即它并不直接取决于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而是以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为基点。这个阶层内包括有依附不同阶级的不同社会集团的成员。而这两个不同的含义又有所区别,一是从经济结构上看,一是从社会角度上看。因为阶级首先是一个经济范畴,同时也是一个更广泛的社会范畴。特别是对那些基本对立阶级以外的社会集团的定性,不仅最终要以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地位作依据,还应当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联系方面来把握,从而确定

① 《考察无锡学堂记》,《汇报》第568号。

② 所引数字均见《警钟日报》学堂调查表。

③ 《永绥厅吴丞遵札考察地方利弊逐一缕陈禀》,《湖南官报》第870号。

④ 《各省武备学生人数表》,《汇报》第645号。

⑤ 《陆军主义之发达》,《警钟日报》1904年3月28日。

⑥ 瘦山道人:《鹤居日记》,壬寅十二月除夕(1903年1月28日),上海图书馆藏,稿本。

他们以经济关系为本质的社会地位。学生群作为知识分子中的一个特定社会集团，与上层建筑的联系更为直接，而归根到底，又是经济基础一定变化发展的结果。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代中国学生群的地位及其前途，不是依存于封建的地主经济，而只能依存于社会经济结构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就是说，它的出现和存在，以资本主义一定程度的发展为前提和基础，它的前途，则由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来决定。在封建的经济基础中找不到它产生和存在的客观依据。同时，由于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一开始就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成份（尽管这种区别最初是不明显的、变动的，往往会相互过渡和转化，但差异和矛盾不能抹煞，正如阶级的界限并不因个人地位的转移而消逝一样），学生群的产生和存在与早期官僚买办资本主义不无关系。但从发展前景来看，学生群不是一般地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联系，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只能使这个集团处于封建阶级附庸的地位，成为御用工具。只有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才有可能为它提供独立发展的前景。所谓它的前途由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来决定，作为近代史一个特定阶段的环节而言，本质上就是也只能是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他们大都不是依附于封建地主买办阶级，而是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在政治上追求民主主义，要求变革封建专制统治，为资产阶级争取政治权利；在经济上则要求发展资本主义，使国家繁荣昌盛。所以，这个学生群基本上是从属于资产阶级的范畴。

学生群的出现，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阶级关系变动的重要方面。在此之前，一批刚刚转化为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的士人如康有为、梁启超和一些在香港及海外接受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如孙中山、容闳、严复等，已经举着民族资产阶级的旗帜登上历史舞台。但是，由于资本家的政治短见，对他们的政治主张和活动往往采取怀疑观望甚至反对的态度。阶级力量的严重不足，是造成孙中山革命活动在一段时期内发展甚缓和戊戌变法骤起骤败的重要原因。从属于资产阶级的近代学生群的崛起，使这种状况得以改观，在民族资产阶级队伍里凭添了一股生气勃勃的生力军，加强了它的行动力量。

就学生群的主要成份而言，与改良派的代表人物也不同，他们与封建统治集团上层的联系不那么密切，受封建传统观念的影响和封建礼教的束缚比较少，而接受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和科学文化知识则比较系统，思想易于激进，斗争性比较强；同时学生们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群居学校，容易形成团体，其活动能量和对社会影响的深度优于改良派的代表。他们逐渐取代封建士人而在知识分子阶层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并且把学生的政治活动纳入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轨道。

应当指出，这个时期的学生群政治上是很不成熟的。他们大都出身封建家庭，从小受过传统儒学教育，许多人入学前还得过功名，轻易不肯摘下头上的封建标记。当时有些学堂新瓶装旧酒，只是换了个名称，官办者犹如衙门，私立者无异私塾，这种客观条件也有碍于学生萌发阶级意识，有的人甚至自囿于封建藩篱。学生主要分为三种类型。“其最下者，无宗旨，无思想，所谓公等碌碌、因人成事者”。第二种入学前已经“学问深，见解高”。二者都只是少数。而“占学生之最多数者”，是那些年幼学浅的少年，入学后“略读西书，稍及报章，其脑筋渐活泼焉。而又得一二通达精进学术之议论，其心之所期者，日以

发达，其身之所受者，日以促逼”。他们闹风潮，“由其屈于抑制者半，由其得于学问者半”。^①在斗争中，第二种类型的学生成为领导核心，有时斗争也因第一种类型学生的动摇干扰而失败。不过，尽管学生群中有些人在思想上与封建士人没有多大区别，有些人则仅仅属于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但他们的政治态度不能成为学生群的旗帜，在风潮高涨之时，他们也往往被推着跟在大多数人的后面走。学生群的主要成份在政治上是追随那些思想激进的代表和领袖人物的。因此，决定学生群的阶级属性及其政治动向的，不是它的落后部分，而是能够左右其主要成份动向的先进代表，后者往往又是资产阶级革命分子。这种“一身而二任焉”的特殊地位，使得学生群以及学生运动，不仅从属于民族资产阶级，而且主要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旗帜下前进。

二、学界风潮的爆发与高涨

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从燎原烈火般的兴起到悲壮的失败，以及在列强刺刀的威逼下签订的屈辱和约，象千斤重锤，敲碎了人心。中国的进步人士在这新世纪开初劈头而来的奇耻大辱下惊醒了！然而，农民群众刚刚经历了惨痛的失败，新的革命高潮能否很快出现？依靠什么力量来实现？在“扶清灭洋”和勤王拥帝的悲剧之后，新的斗争将沿着什么轨道前进？这些必须立即做出明确回答的问题直接摆到了青年学生的面前。

还在帝国主义列强为争夺侵略权益大声吵嚷，而疲惫的东方巨人含愤沉默的日子里，奔腾的地火已经开始在学界孕育发生。1900年冬，杭州求是书院外院第一、二班学生组织了励志社。自立军起义的消息传到这里，学生蒋方震作诗悼念汉口死难烈士，几乎酿成大狱。次年夏，教员孙翼中以《罪辨文》命题，学生们借机发挥，被人告密，激成轰动一时的“罪辨文”案。^②与此同时，南洋公学学生在教习吴稚晖等人的影响下，“思想日以浚，意气日以壮”，认为“学生社会一日不立，则新党一日不能结，中国一日无望”，于1901年4月发起成立公会。总理张元济知道后，开除首事诸生，“学中有志之士，因是去者十七、八人”。^③同年12月，因反对校方无理开除学生，又有6人退学东渡日本。

第一次全体学生退学风潮于1902年春发生在浙江吴兴南浔镇的浔溪公学，它吹响了学潮序曲的号角。该校学生在民主思想的影响下，组织自治团体，设置议长，“凡总理或教习有何命令，彼等皆得集众公议服从或反对之”。他们因经常集会演说，遭到总理庞清臣的干涉，十分愤慨，“以致相约解散”。^④学生们“事前则以火以剑”，^⑤举动十分激烈，表现出对专制压迫的反抗情绪。此后，杭州、苏州、广州、安庆、梧州和江西、河南等地都发生

① 《破坏之教育》，《选报》第35期。

② 蒋纲裳编：《浙江高等学堂年谱》，油印本。

③ 爱国青年：《教育界之风潮》，1903年版，第2章。

④ 陶貽勋：《论学生本分》，《万国公报》第168卷。

⑤ 《南洋公学退学生意见书》，《选报》第35期。

了零星的学生退学或哄动事件，以抗议总办禁阅《新民丛报》、处分阅报学生并焚毁报纸。^①或是反对读《小学》、《孝经》等，他们认为是“不急之务”^②的性理书。杭州中学堂风潮声势较大。1902年5月3日，该堂学生80余人，在汤楹等人带领下，群起反对校方无理斥退同学，并联名控革监督。浙江巡抚任道镕反诬学生“挟嫌诬捏，结群成党”^③，多数学生在压力之下回堂复学，只有汤楹等6人退学到上海，创办《新世界学报》，鼓吹学潮和民主思想。

浙江嘉兴秀水学堂风潮，除了追求民主，反对专制外，还表现出了反帝爱国的性质。该堂学生在进步教习宣传自由平等、国民独立的启发下，民主意识与日俱增，曾因同学黄大镒被学校以“昌言”罪名斥退一事酝酿过退学，“卒以一二性质未化之人，暗中掣肘，好事遂虚”。1902年9月22日，终因外国传教士裴来仪来堂参观时戏击号钟，激起风潮。学生们严正宣称：“号钟是全学堂的主权，以主权把外人做玩弄，就是以学生把外人玩弄。”^④“非特坏学堂体统，实坏全国体统也。”^⑤因总理煽诱家长来堂胁迫学生，退学复遭破坏。但在恢复上课后，仍有人挺身与总理辩论。“最持公理”的龚宝铨等8名学生，因此以“聚众魁首”之名被开除或自行告退。这次斗争成为学潮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先声。

这些事件规模较小，孤立分散；学生们还没有提出政治口号，基本是自发的斗争；其行动也不够坚定，往往直接起因于非政治性事件，风潮发生后又经受不住外界的压力，因此，社会舆论对此反响并不强烈。不过，它们已经表现出了后来学界风潮的一些重要特征。从规模和形式上看，这些事件虽然只是茫茫黑夜中的点点火星，但从一开始就散布于7个省区，广泛地播下了斗争火种。学生们以哄堂、罢课和退学作为反抗校方压迫的主要斗争手段。从内容上看，则显示出了反帝反封建的基本趋向。学生们在民主思想的影响下，把自己与国家、民族相联系，以主人翁的姿态站出来维护国家尊严；其反抗专制压迫的行动和自治要求反映出对于民主政治的向往。这些事件交织成大规模学界风潮的序曲。南洋公学退学生曾明确把浔溪公学和杭州中学堂退学风潮称为“我国学生革命之举”，^⑥看成是自己行动的前驱。《新民丛报》说：“两年以来，若杭州，若广州，若其他诸省，此等小小骚动，既已屡见不一见，虽其间团体不坚，辄被挫折失败，而其机固已大动矣。”^⑦这些斗争表明，国内学生正“翼翼乎挟文明之气而渐种而渐动之”，^⑧预示着更大规模的学界风潮即将来临。

1902年11月16日，南洋公学8个班200余名学生一齐退学，标志着学界风潮的正式爆发。从此开始了第一阶段的学潮。

这次风潮是学生民主思想不断膨胀和学校当局专制压迫日益加重的必然结果。如前所述，早在1901年初，民主空气就开始在该校滋长起来，学生们竞相传阅《国民报》、《译书

① 《广东大学堂纪闻》，《选报》第32期。

② 《河南高等学堂》，《国民日报汇编》。（3）。

③ 《委员查察》，《中外日报》1902年5月17日。

④ 《秀水县学的腐败》，《童子世界》第13号。

⑤ 《教育界之风潮》第10章。

⑥ 《南洋公学退学生意见书》，《选报》第35期。

⑦ 《南洋公学学生退学事件》，《新民丛报》第21号。

⑧ 杜士珍：《学生大进步》，《新世界学报》第10期。

汇编》和《新民丛报》。在蔡元培的引导支持下，于1902年8月成立了演说会，以爱国为宗旨，同时宣称“惟现在之国不必爱，而未来之国良可爱也；老大帝国奚足爱，新中国则必爱”，表现出反对现存统治秩序的意向。会员很快由10人发展到35人，成为学生的组织核心，被同学视为“向导”和“前旌”，“举一切事物之关于革命者，皆于此会发其端焉”。不久，学生们又组织了书会，以研讨如何“担此代表新中国人物新社会事业之大责任”，并有13位具有革命思想的同学暗中联络，建立秘密团体“任会”，作为演说会的中坚，准备应付各种突然事变。在演说会上，“慷慨指陈当世事”，“倡自由革命英风”。在高涨的政治热情的驱使下，他们益发不满于公学的专制束缚。校方禁阅新书报，规定阅者记大过；又严禁结会，声称“会者，天下之大患也”。^①学生不止一次因结会或阅读、散发进步书报而被开除。管理人视学生如奴仆，动辄记过斥退，学生们为此曾多次与校方发生冲突，终于导致了大规模的公开斗争。当时公学五班全体学生以退学反对校方无理开除学生，在他们的带动下，全校学生于11月16日三呼“祖国万岁”，整队离校。

这次风潮立即引起进步舆论的强烈反响和社会人士的普遍关注，《选报》、《苏报》、《政艺通报》、《新民丛报》、《文言报》纷纷刊登报导评论，欢呼“今日之事，为我学生脱离专制学校之新纪元”，^②“举数十年陋儒浅士危言曲说，一举而廓清之，以伸独立之权”，^③强调此“实中国国民前途关系第一重要事件也”。^④广东教育会公开致书赞扬这些青年“为学生辄能抵抗腐败之总办”，“为国民必能抵抗顽固之政府”，“办外交必能抵抗彼强大之列国”，希望他们“亟图所以自立自强之道”。^⑤在中国教育会的支持赞助下，除少数人由于各方面压力散归故里或返校外，145名退学生组成了爱国学社，“师日本吉田氏松下讲社、西乡氏鹿儿私学之意，重精神教育”。^⑥《苏报》称颂学生们“解脱羁绊，排斥专制，创立共和，五日之间，涣然成一维新学校，虽华盛顿之抗英，维廉之抗法，巴西之争自立，神效捷速，殆为过之”。^⑦爱国学社的成立还得到海外爱国华侨和留学生的关注，“仿佛像这个学堂可以造就出来许多拿破仑、华盛顿、加富尔、玛志尼、加里波的、西乡隆盛的一般人才出来”，“敬重得了不得，盼望得了不得”，^⑧有人作诗赞道“青年爱国怀奇气，义塾巍然瞰大江”，称它为“国民表率”，^⑨祝愿它像日本的九州学塾和庆应、大江义塾那样，成为中国革新的摇篮。

南洋公学风潮使国内学界受到强烈震动，学潮在直隶等十余省和北京迅速兴起，出现

① 以上引文均见《教育界之风潮》第4、5章。

② 《南洋公学学生出学始末记》，《政艺通报》壬寅（1902年）第20期。

③ 《破坏之教育》，《选报》第35期。

④ 《南洋公学学生退学事件》，《新民丛报》第21号。

⑤ 《致南洋公学退学诸君书》，《文言报》第15号。

⑥ 《爱国学社章程》，《政艺通报》第22期。

⑦ 《南洋公学学生一朝而同心退学者二百人》，《苏报》转引自《选报》第35期。

⑧ 《教育会会员蒋君性才由日本寄来演说稿》，《苏报》1903年5月12日。

⑨ 《渡美纪行诗》，《湖北学生界》第4期。

了蓬勃高涨的局面，“随其后者不下十处，而散学之风潮且风发泉涌而未有已矣。”^①最早起来响应的是曾首先吹响学潮序曲号角的浔溪公学学生，他们闻讯后公议刊登告白，“敬贺南洋公学学生脱离专制学校”，遭到总教杜亚泉的干涉，29名学生遂一致退学，并且“相庆相贺，谓自今以后，脱离专制学校，与南洋公学退学生不妨并轨齐驱矣！”^②

这一阶段的学潮有几种类型，第一种是反对校方压制学生追求民主。北京五城学堂学生在课卷中畅言自由，校方批以“迹近叛类，倡同异说”，开除4名学生，并报官“欲将学生正法”。学生群起力争，“方有不准复入之谕”。^③北京和广东、福建、江苏、湖北等省的6所大、中学堂学生因管理人顽固守旧，“《新民丛报》等之新书不许阅，自由民权不许言，新词新理不许见于文字”，^④而且课程迂腐，教习“日以国家深仁厚泽为口头禅，以平等自由民权等字眼为眼中钉，要以闭塞学生知识、锢蔽学生聪明为唯一之目的”。^⑤学生往往因为阅读报章，讨论时事，切磋新学而受到处罚。他们愤而表示：“我等以阅报而获过，过如日月，何足为羞？”^⑥“学生为中国未来之主人翁，何辜受此奇辱？”^⑦于是毅然罢课退学。江西大学堂学生则“由压力生出种种文明思想”，在进步教习的引导下，“颇知自立”，“皆喜自由平等之说”，^⑧集资购买新书，订阅《新民丛报》等刊物。“总办欲设法阻之，众皆不应。”他们作诗抒怀道：“沉沉大陆竟如何，睽我黄人感慨多，从此学生争自立，不教烟草蔓铜驼。”^⑨决心以自立求救亡。

南京陆师风潮在这一类型的学潮中颇具代表性。俞明震任该堂总办时，曾一度改良章程，允许阅读新书报，学生仅购阅《新民丛报》就达百余份之多，因此“四方有志者，颇多投入陆师”。^⑩但校方不久即更订章程，将学生权利一律取消，并咒骂新书报“最易坏人心术”，严令“除武备课程不得旁阅一字”，^⑪派人搜查学生宿舍，欲将书报统统烧毁。学生群情激愤，纷纷要求改良堂规，章士钊则以退学表示抗议。

1903年4月2日，校方借故开除因要求改良堂规与监院发生冲突的学生徐大纯，并令兵丁将其立即驱赶出堂。学生们郁积心中的怒火猛地喷发出来，“阖堂鼓噪”，“有张拳声言打者”。接着又聚会演说，大呼“吾辈服国民之义务，奔国民之前途，何等关系？而今食蛮寝野，任此辈鱼肉至此，将来恐求一完全之奴隶而不可得。既不自爱，何以爱国？”“众口一声，声震屋角。”因校方拒绝接受革除监院的要求，31名学生联名告退。陆师学生大都当

① 《驳百忧生书》，《苏报》1903年5月18日。

② 《教育界之风潮》第10章。

③ 《散学汇闻》，《选报》第50期。

④ 《记苏州中学堂江邑六生告退事》，《苏报》1903年4月30日。

⑤ 《福建大学堂腐败之真相》，《国民日报汇编》（2）。

⑥ 《散学汇闻》，《选报》第50期。

⑦ 《录湖北来函述桃花岭普通中学校学生散班事》，《苏报》1903年3月15日。

⑧ 《江西大学堂之历史》，《国民日报汇编》（1）。

⑨ 《记江西大学堂改良事》，《苏报》1903年4月4日。

⑩ 《江南陆师学堂之霉垢》，《苏报》1903年4月16日。

⑪ 《南洋陆师学堂退学生公函照录》，《苏报》1903年4月11日。

年3月下旬才入堂,许多人还互不相识,组织上远不如南洋公学稳固,但仍然齐心协力地挫败了校方的种种阴谋。为了破坏退学,俞明震先是宣布开除章士戛、林懿均等4人,企图迫使学生屈服,不料“学生见之,愈为不平,退志益决”,遂变换手法,指使教习委员“诳以此时无出,总办必有格外相待之恩”,而退学生“皆掩耳顿足以走,无少动者”。俞黔驴技穷,乃将其余学生“悉骗入讲堂,请两洋教习守其门,令内外不得出”。然而这些学生也“皆有去志”,“自谓在堂一日实惭愧一日也”。^①学生们退学后,“拟仿南洋公学之例,组织一学校共和办法”,因俞明震指控其主张革命排满,“欲锄其首谋而解遣之”,^②学生们在南京无法立足,乃与中国教育会筹商,加入爱国学社。

第二种类型主要是反抗封建体罚和学校专制制度的压迫。发生这类学潮的有浙江、江苏、直隶、广东、福建、湖北、河南、陕西、四川、云南、江西等省的14所学堂。这些斗争狠狠地打击了学校里面大大小小的封建官吏和顽固教习专横跋扈的嚣张气焰,使之“自后不敢再专制”。^③四川算学馆委员在学生斗争声势下狼狈不堪,“托人再三说情,又遍向学生嗑头,始得了事”,^④往日威风扫地殆尽。有的学堂学生更进而要求堂中各事及用人须由学生公议施行,以改革学校的专制制度为斗争目标,决心更新“此种野蛮压制之地”,^⑤建立民主制度。

把斗争矛头指向帝国主义教会侵略势力的杭州蕙兰书院风潮是又一种类型的代表。该院由美国浸礼教会创办,侵略者“反客为主,以握我教育权”,不仅管理上腐败专制,而且一再强迫学生入教,激起学生的强烈不满,1903年4月28日,50余人一致退学。他们呼吁社会起来“反抗异种人压制之手段,迫辱之伎俩”,愿以退学“为我瀚江学生与宗教竞争、种族竞争开幕之第一日”。^⑥进步人士对这次斗争评价很高,《浙江潮》誉之为“中国教会学堂惊天动地第一次革命”。^⑦《苏报》则指出:“教会学堂,宗教压制之小影也”,学生们“处教会势力极炽之时而毅然为此”,不愧是“我国民之一大纪念”。^⑧

这几种类型不仅表现了学潮发展的外部状况,而且反映了促使学潮走向高涨的内在原因和动力。追求民主,反对专制的斗争,推动学潮不断高涨,并使这一阶段的学潮具有比较鲜明的反封建性。在26次退学和冲突事件中,因校方禁阅新书报和压制学生民主而起的有14次,反映出民主思潮在学生中高涨的势头。扬州仪董学堂学生在1902年6月还相当守旧,总教习主张停拜孔子,“堂内诸生哗然不服”。^⑨时隔不到一年,在民主思想影响下,学生的精神面貌已焕然一新。他们喜欢用新词、看新书,甚至公开以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

① 《江南陆师学堂散学之原因》,《苏报》1903年4月10日。

② 《江南陆师学堂学生退学始末记》,《苏报》1903年4月24日—5月6日。

③ 《福州学界之蠢》,《国民日报》1903年8月13日。

④ 《时事要闻》,《大公报》1903年2月14日。

⑤ 《浙江大学堂学生退学始末记》,《浙江潮》第3期。

⑥ 《改进学社全体学生公函》,《苏报》1903年6月8日。

⑦ 《杭州美国浸礼会蕙兰书院学生退校始末记》,《浙江潮》第4期。

⑧ 《读〈杭州蕙兰书院学生退校始末记〉书所感》,《苏报》1903年5月11日。

⑨ 《纪扬州学堂》,《大公报》1902年6月20日。

对虚伪的封建仁义道德。当顽固守旧的副总教习训斥学生“读书不可存名利心”时，有人挺身反驳道：“生等进堂肄业，皆为名利，惟名利有公私之别。”^① 学生与学校当局的矛盾日趋激化，反对专制，渴望民主自由，成为他们思想的主导。南洋公学学生就是突出代表。他们在演说中大声呼唤革命，宣称二十世纪为“民族主义普行之时代”，“君主专制一物，诚二十世纪全世界所屏斥者矣”。而“专制弊不以共和继之，逆天也”。因此他们断言：“顺天者，共和也，非专制也；道者，共和也，非专制也。惟共和能久存于世界，惟共和能深得夫人心。”他们把退学看成是与专制政府决裂、实现民主自由独立的起点，认为“公学者，专制君主国之小影也，专制君主国者，公学之放大照相也”，^② 把自己组建的学校称为“共和”学校，并准备创办“共和报”。^③ 南京陆师、浙江大学堂、杭州蕙兰书院和扬州仪董学堂退学生都欲步南洋公学的“后尘”，^④ 组建这种学校。有些学生则以“共和”、“自由”、“人权”为自己的名号。无怪乎《苏报》说：“呜呼！共和学校制度，岂惟是南洋公学二百余人之思想有之，合中国通达士类脑筋步位，无不有之也。”^⑤ 显然，学生们的思想已经不仅仅限于爱国，而是在与封建专制主义的激烈冲突中，朝着革命的方向突飞猛进了。

反对封建专制，追求民主自由成为学生思想的主导，是由中国社会的根本矛盾所决定的。二十世纪初，封建皇权的统治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极端尖锐。随着帝国主义侵略加剧和清政府愈益对外投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传播和国民的觉醒，矛盾冲突急剧发展。对于社会脉搏的跳动反应极为敏感的青年学生的思想，正是这种极端尖锐的矛盾急剧发展的集中表现。所以，虽然学潮往往直接起因于学生与学校当局的冲突，其实质则反映了民主主义与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

在此期间，学生们已经意识到建立团体的重要性。他们说：“革命之不成，无团也”，“必特结一大团体”，以“团与团相争”，“革命始成”。^⑥ 一些学堂中出现了小型学生团体，它们在斗争中成为组织核心，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学生顾虑动摇的弱点和思想参差不齐的局限，增强了力量，有利于挫败校方分化瓦解学生的阴谋。同时还出现了一些区域性的学生组织，如江苏武阳的学生会，计划“设本部于武阳，设支部于海内外各地，凡武阳学生均联为一气”。^⑦ 常熟、常州的教学同盟会和修学社，“组织学界同盟以立国民同盟之基础”。^⑧ 不过，这一阶段学生组织还比较少，许多学堂学生因此不能统一行动，导致斗争失利。

这个时期学生们还不能把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立即转化为直接的反清革命行动，一方面他们认识到，“中国而二千年之专制帝国也，则血战终不可免”，另一方面又说：“使中国

① 《扬州学界中人来函》，《苏报》1903年4月24日。

② 《教育界之风潮》第3章。

③ 《南洋公学退学生意见书》，《选报》第35期。

④ 《浙江大学堂退学生致爱国学社诸君书》，《童子世界》第22号。

⑤ 《南洋公学学生一朝而同心退学者二百人》，转引自《选报》第35期。

⑥ 《教育界之风潮》第1章。

⑦ 《武阳学生会拟章》，《苏报》1903年3月27日。

⑧ 《苏报》1903年4月6日。